

批评话语分析与西方修辞学：共性与分野

何少娴¹，尤泽顺²

(1.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福建 福州 350117; 2.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批评话语分析与西方修辞学都强调了语言的政治功能、对道德与正义的追求、语言的建构作用、批评视角。不过，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的是“语言使用的意识形态功能”，强调分析语言可以揭示潜在在语篇中的意识形态、促进社会公平，因为语言通过认知对听者进行思维建构并参与建构社会现实，其批评视角是一种关注语言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非本位性批评。

关键词：批评话语分析；西方修辞学；政治功能；建构

中图分类号：H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16)06-0052-09

在谈及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的理论来源时，沃达克(Wodak)强调CDA受到西方修辞学研究的影响^①，但她没有详细说明到底哪些方面受到影响？本文总体对比了西方修辞学理论和CDA研究，发现两者之间比较突出的相似性在于：语言的政治功能；对道德与正义的追求；语言的建构作用；批评视角。

一、语言的政治功能

CDA与修辞学最重要的相似之处(也是两者最核心理念之一)就是：语言具有政治功能。在西方修辞学领域，亚里斯多德最早对此进行阐释，不过，他所说的语言有时是指一种符号系统，有时又指语言使用。他把语言与政治作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两大特征联系起来，强调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生来具有合群的特性”^②，但是人类是唯一能够说话的动物。这使人类不仅能像其他动物那样表达悲欢，还能对事物的利害和正义与否进行说明，后者正好就是家庭和城邦等组织得以形成的基础，所以“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③。人类的合群特性是其政治行为出现和发展的基础，语言是这一切得以实现的唯一手段；没有语言，人类之间的“高级组合(政治)”就不太可能出现，他的群聚生活与普遍存在于其他动物世界的群聚生活就不具有任何根本性区别。可以看到，当他说语言和语言能力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特征时，他指的是语言作为一种符号以及人获得和使用这种符号的能力，而当他说明人类可以用语言来“表达悲欢”及“对事物的利害与正义与否进行说明”并由此形成

收稿日期：2016-05-14

基金项目：本研究系福建省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话语与社会互动的认知机制研究”(JA1303)和福建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海上丝绸之路’话语与福建区域形象的修辞构建”(20140B07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少娴，女，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政治修辞学、语用学、二语习得研究；尤泽顺，男，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话语分析、政治修辞学、跨文化交际研究。

^① Wodak, R. & M. Meye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istory, agenda,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2n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Sage, 2009, pp. 1-33.

^{②③} 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7页。

政治时, 他指的却是语言使用所形成的功能。

必须明确的是, 亚里斯多德所说的“语言使用具有政治功能”是一种普遍存在于社会各个角落的现象。他指出, 政治不仅是国家和政府等层面上的一个概念, 还是一个包括家庭等在内的其他组织层面上的概念, 是一个遍布于人类社会各个角落的东西。与此相类似, 语言使用也是一种遍布于人类社会各个角落的东西, “不仅仅是城邦的各个公共机构离不开共有价值观念和语言, 其他社会组织 (不只是亚里斯多德当时所在的社会理解的‘家庭’, 还包括那些处于附属地位的奴隶和妇女) 也离不开它们”^①。所以, 政治功能并不是国家层面的组织独享的, 其他社会组织 (包括处于社会底层的组织) 也可以享有, 即它是一种中性的东西。

与修辞学的观点相似, CDA 也认为“语言使用具有政治功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东西。范戴克指出, “CDA 是一种语篇分析研究, 它考察的主要是社会权力滥用、支配和不平等如何在社会和政治语境中的篇章和谈话中得到呈现、再生产和抵制”^②。篇章 (text) 和谈话 (talk) 即可以呈现和再生产权力、支配和不平等, 也可以抵制它们, 也就是说, 语言使用 (包括篇章和谈话) 具有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政治功能。威尔森更是直接强调“对于 CDA 来说, 几乎所有的话语都可能被看作具有政治性, 对话语进行的各种分析也可能都具有政治性, 所有的话语归根结底都是政治话语。”^③ 其政治性话语可以粗略分为两个层面: 主要与社会文化层面 (即政治学领域所说的“市民社会”) 相关的话语和与国家政治 (包括国家和政府) 及政治学层面关系特别密切的话语。

不过, CDA 更经常使用“语言具有意识形态功能 (后果)”来表达“语言具有政治功能”这一观点, 并往往下意识地赋予其贬义的含义。费尔克拉夫和沃达克说“CDA 将话语——口头语言使用和书面语言使用——视为一种社会实践……话语实践会导致重大的意识形态后果, 即它通过表征事物和确定人们在社会中的位置来帮助生产和再生产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男/女之间、不同种族/文化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④ 这种“意识形态后果”发生在社会各个层次的组织中, 往往以隐蔽的方式出现。虽然 CDA 一再强调它是中性的, 但其研究实践却又往往倾向于将之视为贬义的, 即“语言也是支配和社会力量的一种媒介, 它为有组织的权力关系的合法化提供服务。只要权力关系的合法化……没有在语言中明确表达出来……语言也就具有意识形态特征。”^⑤ 语言系统本身并没有意识形态功能, 后者是由于话语生产者的选择性使用才形成的, 即“规定性的语法结构本身不可能具有意识形态标记, 因为这些结构对于所有说话者来说都是一样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它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应该是中性的”^⑥。虽然部分学者认为, 用于表达不同性别的词汇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倾向性, 如 Chairman 一词从其构词形式来看就表现出明显的歧视女性的含义。但是, 这仅仅表明某些语言结构特征比其他特征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敏感性”, “比如, 语义就倾向于比句法结构具有更强的意识形态标记, 因为意识形态是信念体系, 而信念体系很显然更可能通过话语的意义表达出来。句法结构和

① Chilton, P.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5.

② van Dijk, 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D. Schiffrin, D. Tannen & H. Hamilton (eds.).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Oxford: Blackwell, 2001, p. 352.

③ Wilson, J. Political discourse. In D. Schiffrin, D. Tannen & H. Hamilton (eds.).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pp. 399 - 415). Oxford: Blackwell, 2001, p. 398.

④ Wodak, R. & 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T.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Vol. 2)*. London: Sage, 1997, p. 258.

⑤ Wodak, R. Aspect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ZfAL* 2002, 36, p. 11; Wodak, R. Critical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J. Verschueren & J. Östman (eds.). *Handbook of Pragmatics*. Amsterdam: Benjamins, 2006, p. 4; Wodak, R. & M. Meye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istory, agenda,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2n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Sage, 2009, pp. 10.

⑥ van Dijk, T. Ideolog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006, 11 (2), p. 126.

隐喻、夸张或委婉语等修辞格式经常被用于强调或淡化意识形态意义,但是作为形式结构,他们本身并没有意识形态意义”^①。在具体话语中,根本不存在某一类具有种族主义或反种族主义特征的“夸张、代词化(Pronominalization)或语调”。可以说,分析具体语言使用可以揭示隐含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基本理据也在于此。

正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CDA才与亚里斯多德一样,把语言分析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与语言使用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并明确CDA研究具有“政治性”。^②不同的是,(亚里斯多德)修辞学研究的是语言使用如何在社会政治问题讨论过程中达到劝说别人的目的,CDA探讨的则是如何通过分析语言揭示和参与意识形态建构并由此改变社会现实、促进社会公平。显然,如果没有接受“语言具有意识形态(政治)功能”的观点,CDA就不可能走上“通过语言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道路。

二、对道德和正义的追求

CDA与西方修辞学另一个重要共同点是两者都强调了“对道德和正义的追求”在其研究中的特殊意义:修辞学研究总是与实现一个正义的和有秩序的社会联系在一起,CDA把实现人类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作为自己研究的最终目标。

西方修辞学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把“对道德和正义的追求”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观。众所周知,修辞是“一个劝说过程”。可是,这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劝说过程,而是“对正确行为的发现和劝说”^③,就像兰德(Randall)说的,“几乎可以毫不困难地从西塞罗、亚里斯多德那儿,追溯到贯穿在中世纪和现代文学人文主义传统中一个最重要的信念,那就是,对好的写作和演讲的研究,必须不可分割地与对正直的生活的研究联系在一起”^④。

柏拉图认为,“追求正义和道德”应是演讲的本质。在《斐德罗篇》中,他借苏格拉底的口指出,一种真正的演讲术并不仅仅是为了劝说,它还有教化民众,使之朝着真、善、美方向不断完善自己的责任;遵循正义和真理的原则是一位伟大雄辩师应有的品质,“只有那些为了阐明正义、荣耀、善良,为了教诲而写下来的作品,才能做到清晰完美,具有庄重、完整、严肃等特征,才会对听众的灵魂起着矫正作用。这样的文章才能被称作人的合法的子女,这样说主要指那些自己写的文章,其次也可以指自己的文章在其他人的灵魂中产生的作用”。^⑤据此,他批评修辞往往不是从正义和真理的立场出发,而是以一般人的看法或意见为基础进行劝说,其目的是通过满足受众的偏好来操控它们。

亚里斯多德在“修辞是为了追求正义和道德”这一点上与自己的老师意见并无相左,虽然他不赞同柏拉图对修辞的批评。他指出,修辞术与论辩术一样都以或然性证明或论证为基础,演讲者都能从正反两方面入手进行论证,正反论证不会导致事实被歪曲或掩盖,相反的,事情的真相在论证过程中会越辩越明,这是因为,“真理和正义自然比它们的对立面强一些”,修辞术的功能并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件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造成‘诡辩者’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的意

① van Dijk, T. Ideolog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006, 11 (2), p. 126.

② Kress, 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90, 11, p. 85; Kress, G. Represent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Questions for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C. R. Caldas-Coulthard & M. Coulthard (eds.). *Texts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15; van Dijk, T.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and Society*, 1993, 4(2), p. 252.

③ Duhamel, P. A. The function of rhetoric as effective express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49, 10, p. 356.

④ 胡曙中《美国新修辞学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9页。

⑤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II》,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2页。

图”^①。修辞术其实就是伦理学, 因为两者都是为了社会培养有道德教养的人。虽然议政演讲、法庭演讲和宣德演讲论证的焦点不同, 它们论证的都是那些在听众看来是“正义的”和“有道德的”东西。西塞罗和昆提利安也将修辞学视为推动社会进步, 提升社会道德和正义的最主要途径之一。

在当代, 西方多数学者仍然相信“追求道德和正义”是当代修辞学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尤班克斯(R. T. Eubanks)和贝克(V. Baker)认为, 修辞学只有与人类最重要的价值观——道德和正义——等相联系, 寻求一种健全的文明价值观, 并为此承担义务, 才能真正为实现人类的最高目标服务。古典修辞学的主要功能就是提高人类价值观, 实现通过正义和秩序概念来表达人类生活的最高目标, 这是修辞学担负的价值论使命。20世纪, 人类社会在价值观念上出现不少问题, 修辞学作为培养人类价值观念的一种重要方式, 对于纠正这些弊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今天再次强调修辞学价值论的直接效果是促使修辞学教师和学生都积极投入对人性智慧的寻求, 也使修辞学这一具有悠久历史的学科或者说艺术本身“可以更接近柏拉图式的理想——修辞学的主题永远是关于正义”^②。

与修辞学相类似, CDA一再强调, 正是“追求道德和正义”这一目标才使得原来不同形态的话语(语篇)分析走到一起, 形成目前人们所看到的CDA研究。对于CDA来说, 语言分析只是第一步, 最重要的是要通过语言分析揭示潜藏在话语中的意识形态, 并由此促进社会变革, 消灭社会不公, 形成一个较为公正的社会秩序,“(CDA的)意图是通过分析具有强大威力的文化产品——文本来解释其运作和影响, 使这个极度不平等的权力体系陷入危机, 以期建立一种更为公正的社会秩序。这是一种‘转变’问题, 即打破现存秩序, 将其转变为新的社会状态, 使一部分社会成员所受的危害减弱, 或使所有成员都能获得更多好处”^③。在此, 社会公正的标准是所有成员从社会中获益相同。另一些学者则主要从“是否受到不平等对待的角度”来表述“社会不公”, “批评话语分析……实践者必须通过施加影响来对周围世界进行改造, 并由此建立一个新世界, 使人们不再因为性别、肤色、信念、年龄或社会阶层差异等受到歧视”^④。显然, 不管是“获益相同”还是“平等对待”, 其实质都是强调“道德和正义”。在研究实践中, CDA也特别注重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社会不公及强势群体压迫等进行揭示。

不过, CDA这一观点并非源于西方修辞学, 而是源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对人的价值的追求和对“公平与正义”的强调。^⑤其直接来源则是法兰克福学派。^⑥当然, CDA在如何实现“道德和正义”的方式上与哈贝马斯的观点存在差异, 西方修辞学则与哈贝马斯有较多重叠。CDA认为, 实现公平的最基本手段是语言分析, 即面对当代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源等分配不均的局面, 可以通过分析语言来揭示潜藏在语篇中的意识形态, 从认知上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 由此促进社会变革并最终改变社会现实本身, 形成一个公平的社会秩序。哈贝马斯认为, 实现公平的手段是运用语言进行协商, 即现代社会的矛盾和危机是由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及主体间的沟通不畅等原因造成的, 消除这一矛盾的方法是面对问题时要加强协商, 达成共识, 由此实现社会公平。西方修辞学认为, 实现手段就是恰当地将包括语言等在内的一切资源运用于劝说过程, 因为修辞学讨论的是如何运用现有的资源

①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 罗念生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第20页。

② 胡曙中《美国新修辞学研究》,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年, 第189页。

③ Kress, G. Represent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Questions for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C. R. Caldas-Coulthard & M. Coulthard (eds.). *Texts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15

④ Caldas-Coulthard, C. R. & Coulthard, M. (eds.). *Texts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xi.

⑤ 尤泽顺、陈建平《批评性语篇分析: 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语言研究》, 《中国社会语言学》2013年第2期。

⑥ 尤泽顺《哈贝马斯哲学社会学思想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影响》, 《话语研究论丛》2016年第2期。

成功实现对受众的劝说,它建立在“正义必然强过非正义”这一基本理念上,劝说(论证)过程就是一种寻求真理和正义的过程,是修辞(包括语言)资源的正确运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修辞学的劝说其实就是哈贝马斯沟通协商的一种方式。

三、语言的建构作用

CDA和西方修辞学的第三个相同之处是两者都认为语言具有建构作用。柏拉图在哲学和修辞讨论中就认为,意见是语言虚构的东西,修辞就是运用语言进行建构的诡辩术。他从区别实在和现象出发,把人对世界的认识分为知识和意见,同时把世界分为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并指出,知识属于超感觉的永恒世界,是不可能错误的,而意见属于感官所接触的世界,是可能错误的;理念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而感官所接触到的具体事务构成的世界则是虚幻的世界。^①知识是与真实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知识就是真理,意见则与虚幻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演讲是追求真、善、美的艺术,是由知道真理(知识)的人来展现的,而修辞往往“运用语言的力量,使微不足道的东西显得很重要,使重要的东西显得微不足道,使新颖的东西显得陈旧,相反也能使陈旧的东西显得新颖。他们还找到了如何进行精确论证的方法,但也可以就任何话题,就每个话题发表冗长不堪的论证”(《斐德罗篇》)。^②

亚里斯多德虽不赞同柏拉图的批评,但他也承认“语言具有建构(操纵)功能”。他指出,对于任何一件事,从正反两方面入手进行论证会使事情的真相越辩越明。由于修辞的受众是普通民众,讨论的话题是与民众相关的一般性话题,因此,“对大众致辞时,我们所用的证明和道理都应该立足于一般人普遍接受的原则上”,^③不是柏拉图所说的真理或知识。修辞语言使用不能流于平凡,也不能拔得太高,而是要力求适合。要真正打动受众的心,演讲者既要要对修辞文本进行“精心构筑”,又必须“把他们的手法遮掩起来,使他们的话显得自然而不矫揉造作;话要说得自然才有说服力,矫揉造作适得其反,因为人们疑心说话的人在捣鬼,就像疑心酒里掺了水一样”。^④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决不是无足轻重的事,它关系到修辞效果的好坏,这也是演说语言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美国新修辞学家也认同语言的建构功能,并借鉴认知研究、语义研究及其他研究的最新成果证明“运用语词的力量,不仅是为了诚实地进行交际,而且也是作为进行欺骗的手段”^⑤。奥格登(C. K. Ogden)和理查斯(I. A. Richards)从认知角度出发,通过讨论思想(所指意义)、词语(符号)和物体(所指物体)之间的关系来阐明“语词如何起作用”。传统观点认为,名称是事物的指示或描写。奥格登和理查斯却认为,所指意义和符号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一个词组的使用可以在听者的头脑中形成于一种类似于说话者自己的思想,所指意义也会触发人们使用某一符号来表示这一意义;所指意义和所指物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只要所指物刺激了有机体,并促使它进行思考,所指物就已经形成一种意义。由于所指意义和符号之间及所指意义和所指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规定性的,意义和符号间并不是一种对等的关系,意义和所指物之间也不是对等的关系。因此,符号和所指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对等的,它们间仅是一种以意义为中介的间接关系。用符号来表示某物并不是真正表达了某物,它仅仅是通过意义间接地表达了它而已,或者说,它仅仅表达了某个物体的符号意义,并不是表达所指物本身。在现实生活中,同一个词对于不同人或在不同场合来说可能意味着不同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②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II》,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 Aristotle. *On Rhetoric: A theory of civil Discourse* Trans. by G. Kenne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5.

④ 亚里斯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4页。

⑤ 奥格登、理查斯《意义之意义:关于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及记号使用理论科学的研究》,白人立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的语境、模式和联想; 一个词或符号可能有许多所指意义或思想, 不同人对同一个符号会形成不同的阐释, 每个人的阐释在不同时间或场合还会发生变化。然而, 人们往往误认为它们之间是直接对等的, 对于词语可能产生歧义和定义不确定性等视而不见, 这就给了话语使用者利用语词来充分表达自己意图——不管是正面劝说意图还是反面欺骗意图——的机会。从积极的角度来说, 它能使话语使用者轻而易举地说出许多有细致差异的话, 让听众从中看到一种美丽的前景, 从而使自己的观点得到别人的赞同。从消极的角度来说, 话语使用者可以通过精心编造的话语, 故意向听众发出错误的导向, 使他们因为本不存在的东西而改变自己原来的立场。也就是说, 由于符号、意义与所指物之间的脱节以及普通民众对这一脱节的忽视, 话语使用者利用这一点可以在听者的头脑中构建出一种符合自己意图、又能为听者所接受的思想, 并将之作为一种“事实”传递给听者, 不管这一思想与真正的事实较为接近或完全相反。

与修辞学在“语言的建构功能”上不愿意进行正面回答的做法有所不同的是, CDA 明确指出, 承认“话语的建构作用”是 CDA 整个研究得以开展的最重要依据之一。沃达克在讨论“话语”概念时指出, 目前 CDA 对于“话语”一词的认识还存在许多不同, 但是大多数 CDA 研究者都同意话语与社会现实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 即话语受到社会现实的限制, 同时, 话语又参与建构社会现实。^① 如果不承认话语的建构作用及与之相连的话语反映社会现实, 那么 CDA 希望通过分析语言来揭示潜藏其中的社会权力关系并由此改变社会现实的愿望就不可能实现。

费尔克拉夫认为, 话语与社会现实之间不是一种单向的建构关系, 而是一种互构关系, 社会现实不仅是话语建构的前提条件, 也是话语建构的结果。福柯提出的“话语的建构作用是一种普遍特性, 社会的一切(包括社会本身)都是话语建构的结果”, 这一观点颠覆了传统那种认为社会现实是给定和先在的东西的观点, 使人们能够从另一个侧面观察社会现实, 特别是观察“话语秩序在话语实践过程中的历史变迁以及它们与更广范围内的社会和文化变迁过程的关系”。

(1) 话语的建构特性——话语建构了社会, 包括“客体”和社会主体; (2) 话语互为交织 (Intertextuality) 和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任何话语实践都是由其与其他话语实践的关系来确定的, 并以各种复杂的方式从其他话语实践借用了很多东西; (3) 权力的话语特性——现代“生物权力” (Biopower) (如审查和忏悔) 在很大程度上是话语性的; (4) 话语的政治特性——权力斗争都是发生在话语当中或话语之间; (5) 社会变迁的话语特性——话语实践变化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② 但是, 福柯忽视了一个现实, 那就是, 话语实践并非完全自由运作, 它也受到社会现实的限制, 话语实践“必定是发生在一种已然经过建构的物质现实中, 其中有已建构的‘客体’和社会主体”^③。

就其建构作用来说, 话语不仅表征了世界, 而且通过意义指示 (Signify) 了世界、构成了世界 (Constitute) 和建构 (Construct) 了世界。在韩礼德关于“语言具有概念功能、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等三大元功能”的启发下, 费尔克拉夫提出, 话语的建构功能包括三个方面: 话语建构了社会“主体”和不同类型“自我”的“社会身份”和“主体地位”; 话语建构了不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话语建构了知识和信仰体系。^④ 具体到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实践可以看到, 话语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建立、维持和改变了权力关系以及使权力关系得以形成的那些集体组织 (阶级、集团、社团、群体); 话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从不同形式的权力关系中建构、自然化、维持和改变了世界的意义表

^① Wodak, R. & M. Meye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istory, agenda,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2n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Sage, 2009, pp. 1-33.

^{②③④}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pp. 55-56, 60, 64.

达。^①

可以看到,修辞学所说的建构是指语言对受众思维的建构,而CDA不仅强调语言对听者的思维建构,还强调这一建构对听者看待世界方式的影响(包括听者如何形成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听者如何看待社会中的“客体”等)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现实的建构和变迁。此外,CDA强调建构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即社会现实是话语形成的基础,话语反过来对社会具有建构作用;修辞学虽然讨论了话语的建构作用,但对于社会现实在话语形成中的作用,它并没有进行强调,而是把它当做一种自然而然的東西。究其原因就是,一直以来,语言学都是以语言本体研究为主,很少关注社会问题,CDA试图超越传统研究方法,寻找一条从语言分析通往社会问题研究的独特路径,其研究思路决定它必须强调社会现实对语言使用的影响。与此不同的是,在古希腊,修辞学本身的社会参与程度高,是一种先社会实践后理论研究的学说,即使是现在,政治演说及其他公共演说仍然是社会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话语活动。作为以此类话语活动成功实施为研究目的的修辞学,其理论构想及研究显然已经将“社会现实对语言使用具有重要影响”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条件加以利用。

四、批评视角

CDA和西方修辞学的第四个相同之处是两者都提倡研究的批评视角,包括对研究本身的批评视角和对研究问题的批评视角,但西方修辞学一直以来强调的是前者,而CDA关注的是后者。古典修辞批评研究最早起源于柏拉图对修辞术的批评及亚里斯多德的回应,但这些批评不具有系统性。柏拉图指出,修辞学家们根本不去考虑什么是正义或善良的行为,他们唯一关心的是陈述,对他们来说,在控告和辩护时,最重要的是“用听起来有理的话语来取代事实,无论你在说什么,首先应当注意的是这种合理性,要自圆其说,根本不用去管什么真相”。^②亚里斯多德则针锋相对,指出“任何一个论题都必须可以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修辞应以一般人的看法为基础”及“修辞既要精心构筑又要避免被受众发现”等。之后的西塞罗、昆提利安及其他修辞学家并没有停止修辞批评研究,而是将其研究不断地向纵深方向推进,并在“修辞批评的标准、目标、功能及受众等问题上体现出了较强的学理性”。^③

相比之下,当代修辞批评呈现出了较强的理论系统性,研究对象也得到极大拓展,但是修辞批评的本位性在研究中仍然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其主要关注点仍然是修辞过程本身。^④近年来,“修辞过程”中心论正在发生动摇,一些研究不仅关注修辞过程,而且开始更加关注语言权力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温科学认为,二十世纪的西方修辞批评可以笼统地分为五个流派:传统修辞批评、经验主义修辞批评、戏剧主义修辞批评、社会学修辞批评和后现代主义修辞批评。^⑤王志伟进一步指出,如果根据关注对象来划分,当代西方修辞批评体系其实就是两大类:修辞批评和批评修辞。前一类包括传统修辞批评、经验主义修辞批评、戏剧主义修辞批评、社会学修辞批评,主要以修辞过程为研究对象,后一类就是后现代主义修辞批评,又称“意识形态修辞批评”,主要“对修辞话语中那些决定人们对社会各方面阐释的信念体系进行的评论或者说对决定某一群体行为的基本社会经济政治或文化兴趣的信念体系进行的评论”^⑥,即关注文本中权利与知识的结合以及如何进行破解。两类修辞之间的区别

①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p. 67.

②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II》,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4-195页。

③④ 袁影《修辞批评新模式构建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9、12-22页。

⑤ 温科学《二十世纪美国修辞批评体系》,《修辞学习》1999年第5期。

⑥ 王志伟《修辞批评之批评修辞:论意识形态修辞批评模式》,《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7期。

主要是: 1. 两者的批评目的、理论框架以及所遵循的批评规范等有所不同, 批评修辞重视揭示语言、权力和关系, 修辞批评重视分析象征行为和象征符号的交际效果; 2. 批评修辞更多地与政治批评纠缠在一起, 修辞批评仍然注重以修辞为研究本位性。^① 这就是说, 西方修辞批评从古希腊到现在, 其强调重点一直是对研究本身的批评视角, 但当代修辞批评的某些研究也开始重视对研究问题的批评视角。

与西方修辞学有所不同的是, CDA 强调的重点是对研究问题的批评视角, 从这个角度来说, 批评修辞实际上类似于 CDA 早期的研究形式。CDA 在不同场合表明自己与传统语言学研究的最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其采用的是批评视角, 而后者采用的是非批评视角; 其批评视角决定他们注重揭示语言、权力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解决社会问题, 不是像传统语言学那样分析语言本身。^② 当然, CDA 对批评的使用比批评修辞的理解要丰富得多, 它至少包括如下含义: 1. 批评要揭示语篇与权力的关系, 揭示语篇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意义; 2. 这种揭示是很必要的, 因为语篇与权力的关系在语篇中非常隐晦; 3. 批评意味着语篇研究者要对自己的立场进行反思, 使其批评实践非常明确的反映自己的立场; 4. 批评具有解放的性质, 所以批评要注重效果, 要导致社会现实的变革。^③ 这些不同含义从 CDA 研究者的讨论可以看出来, 如费尔克拉夫借用布尔迪厄的话指出, “将一种方法 (CDA) 称为 ‘批评性的’ 是承认社会实践总体与我们具体的语言使用都隐含着各种因果关系, 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对此可能毫不察觉”^④, 即强调批评视角就是强调语言与社会间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 要注意通过语言分析揭示这一关系。范莱温也指出, “称自己是 ‘批评性的’ 就意味着具有较高的道德标准: 他意图清楚表明自己的立场、研究兴趣和价值及使自己的标准尽量透明, 并且觉得不必为自己研究的批评性立场道歉”^⑤, 其言下之意是, “批评性” 是一种针对研究问题的个人正常立场, 对某一问题进行批评研究仅仅表明你的立场是批评性的, 与问题本身没有关系。沃达克则指出, 批评理论和 CDA 都希望 “生产和传播批评性知识, 使人类能够通过自我反思来摆脱各种统治, 获得解放, 因此他们的目标是导致 ‘启蒙和解放’。这些理论不仅寻求对某个特定的假象进行描述和解释, 还力求寻根问底, 找出其最终原因”^⑥。也就是说, “批评性” 意味着不仅要描述表面现象, 而且要揭示存在于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对于针对研究实践的批评, CDA 没有那么直接进行强调, 而是用 “反思性” 这个术语来讨论。也正因为如此, 一些学者提出质疑, 认为 CDA 一再强调对话语进行批评, 却很少对自己 (话语和研究) 进行批评。比如, 图兰 (Michael Toolan) 指出, CDA 主要研究和质疑话语实践中的策略使用, 却很少认真思考自己的话语策略使用问题, 它首先应该对自己的话语策略进行必要的批评。^⑦ 纵观 CDA 的相关理论讨论和实践研究, 我们只能说它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够直截了当。更重要的是, 它

① 王志伟 《修辞批评之批评修辞: 论意识形态修辞批评模式》, 《新闻爱好者》2012 年第 7 期。

② 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Longman, 1989;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van Dijk, 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D. Schiffrin, D. Tannen & H. Hamilton (eds.).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Oxford: Blackwell, 2001, pp. 352–371; Wodak, R. & M. Meye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istory, agenda,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2n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Sage, 2009, pp. 1–33.

③ 赵苒、田海龙 《批评性语篇分析之批评: 评介与讨论》, 《南京社会科学》2008 年第 8 期。

④ 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Longman, 1989, p. 5.

⑤ van Leeuwen, 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K. Brown (ed.).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 32)*. Oxford: Elsevier, 2006, pp. 293.

⑥ Wodak, R. & M. Meye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istory, agenda,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2n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Sage, 2009, p. 7.

⑦ Toolan, M. *What i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why are people saying such terrible things about it*. In M. Toolan (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Vol. 3)*.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219–241.

主要使用“反思性”来表述对本学科的批评性审视行为,这一方面可能是为了突出它所说的“批评”与其他研究所说的“批评”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可能是想通过借用“反思”一词表明其与哈贝马斯、布尔迪厄及吉登斯等在此问题上的联系。费尔克拉夫曾指出,包括CDA在内的所有“批判性”社会科学都具有“反思”特征,即社会科学“……对研究者自身活动所处的历史和社会位置必须具有反思性理解”^①。弗拉尔迪沃在反驳泰尔维特·德拉克(Tyrwhitt-Drake)对CDA理论缺陷的批评时强调,CDA具有反思性,这保证它对文本分析结果进行阐释时不是基于一种预先设想的观念,而是以话语的实际呈现为立足点;通过熟悉文本呈现的情景语境,研究者就能够对分析结果进行阐释,同时,在分析文本的微观话语特征时,研究者也可以从话语产生的情景语境中获得某种洞察力。^②总之,虽然二者所讨论的“反思”在含义上有些差异,但都表明CDA也注重对自身研究采取批评视角。

五、结论

西方修辞学理论和CDA研究比较突出的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语言的政治功能;对道德与正义的追求;语言的建构作用;批评视角。修辞学通过研究和分析语言这一人类普遍共有的能力及其使用来考察政治的各个方面,其核心的观点之一就是“语言使用具有政治功能”;CDA把几乎所有的话语都视为具有政治性,语言的意识形态(政治)功能不是语言系统本身的特征,而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由于话语生产者的选择性使用才形成的。西方修辞学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把“对道德和正义的追求”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并认为修辞学是推动社会进步、提升社会道德和正义的最主要途径之一;CDA将“追求道德和正义”视为其研究的最终目标,并认为通过分析语言来揭示潜藏在语篇中的意识形态可以促进社会变革,形成一个公平的社会秩序。修辞学所说的语言建构作用是指语言对受众思维的建构,而CDA不仅强调语言对听者的思维建构,还强调这一建构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和变迁等的影响。西方修辞学的批评视角主要是一种关注修辞过程的本位性批评,CDA的批评视角是一种关注语言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非本位性批评。

(责任编辑:陈芳)

^① Chouliaraki, L. & Fairclough, N.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5.

^② Flowerdew, J. De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9, 31, pp. 1089 - 1099.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Western Rhetoric: Commonality and divergence

HE Shao-xian , YOU Ze-shun

Abstrac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and Western Rhetoric (WR) share commonalities in such views as follows: Language has political role; language use should not be cut off from the pursuit of moral justice; language is constitutive; language use should be critically scrutinized. Yet CDA advocates that it is language in use , rather than language as an abstract system , that plays the ideological role. Only by analyzing the language in use can one reveal the ideology embedded and help promote social equality since language , by influencing one's cognition and thinking , helps shape his/her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reality. The critical scrutiny is oriented toward social issues instead of the research in its own field.

The Polyphonic Discussion: Realism and Romanticism Theory Discourse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wentieth Century

HUANG Jian

Abstract: Since twentieth century , realism and romanticism theory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 and occupied the main position in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y thinking , covere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research mode ,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ry experience was fitted into the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realism or romanticism , but in this process , Chinese literary experience was resisted the override of the western theory , and left its imprint on the discourse of western theory , forcing western discourse reconstruction , thus forming a kind of polyphonic form of discourse structure , such structure is a unique form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theory

The Effectiveness and the Ineffectiveness of Discourse in Author Theory of Michel Foucault

TENG Cui-qin

Abstract: Michel Foucault advanced Functional Author to confirmed the power of discourse , which can be seen everywhere in the paper What Is Author. Meanwhile , we can find some marks about the ineffectiveness of discourse. First , Foucault never mentioned the social ideology about Genius. Secondly , the reader-role in the society after the loss of the author's authority was missed. In the end , Foucault also didn't expound the social reason of the Death of Author. The three problems are the premises and the outcomes of Functional Author. Certainly , these conflicts don't drag down the magnetism of Discourse.

Interactive criticism: as a possible critical strategy

——Starting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njamin and Baudelaire

JING Li-peng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y contains that literary activities include four basic elements: the world , artists , works and readers , which result i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research generally be limited in a static and closed research on individual factor. However , on one hand , the interactive criticism pays attention to the excava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targets of criticism; on the other hand , it focus on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target of criticism criticizes the critic in reverse at the same time ,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textual and